

唐代「佛傳文學」研究

張家豪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佛教入華的諸多傳說中，東漢明帝夜夢「金人」之說流傳頗廣，至唐代敦煌莫高窟 323 窟中仍有「張騫出使西域圖」，將《魏書》所載張騫出使西域及漢武帝獲匈奴金人之事同畫於北壁，由此「金人」傳說可見佛教初傳時，人們所關注的焦點當欲了解佛陀為何人？何以成大神？等教主相關事蹟。故佛傳經典亦早在佛教初傳之東漢時代即譯出《修行本起經》與《中本起經》，並在唐前陸續翻譯，至隋代譯出《佛本行集經》達六十卷可謂集大成之作，可知佛陀生平事蹟始終為信徒所關注，而佛陀曲折的成道故事亦適於宣教說法之用，並為文學創作極佳之題材。此一文學題材在唐前即有少數如：支遁、沈約等高僧、文士運用於詩文，並有梁代名律師僧祐彙編經典而成《釋迦譜》，到了唐代則更廣泛地流行，成一重要文學主題。本論文中即分別論述唐代時高僧、文士、庶民三種不同社會階層，從各自不同視角所進行的佛傳文學創作，說明「佛傳」於唐代文學中發展出何等多元之面向、特色與價值。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動機、範疇、方法。第二章概述唐前佛傳漢譯與流傳情況，可見支遁較早以佛傳為主題創作，僧祐《釋迦譜》彙編佛傳之影響力及於唐代道宣之作，另外，佛傳故事亦與「佛誕」、「行像」、「齋戒」等相關宗教儀式、活動結合，成為文人抒情之詩作題材。第三至六章則聚焦唐代，分別以高僧道宣《釋迦氏譜》、文士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與〈釋迦佛賦〉、以及流行於庶民大眾的敦煌佛傳文獻為討論核心。其中指出道宣作品之護教、宣教精神。考辨王勃為〈釋迦佛賦〉作者的可能性。並整理豐富的敦煌佛傳文獻，說明其實際展演之空間、時

間與方式。結論中則以較宏觀視角審視唐代佛傳文學。

論文中首先勾勒出佛傳經典在東漢初譯後，至唐代陸續的翻譯、整理、流行與再創作之情況。就漢譯佛傳經典而言，短篇的《過去現在因果經》與集大成達六十卷之《佛本行集經》是唐代較流行之經典。《過去現在因果經》於初唐應頗受歡迎，故得以製成繪卷遠傳日本，並被抄寫入十卷本《釋迦譜》中，為道宣所採納，並融合其所撰地理書籍《釋迦方志》，增刪改寫成《釋迦氏譜》，其中對中印度之諸多描繪為僧祐釋譜中所未見。另外，集「佛傳」大成之《佛本行集經》長達六十卷，在唐代亦廣受重視，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文中出場人物有「金團天子」又有「作瓶天子」，在佛傳典籍中僅《佛本行集經》有相應之人物，可見脫胎自《佛本行集經》，此經又在敦煌留存之佛傳寫卷中，卷數為諸佛傳經典之冠，數種變文類作品可見其源於《佛本行集經》再雜採諸經而成篇，足見此經典深遠之影響力。

經典陸續譯出後，唐前已可見僧人、文士將之整理或轉化為文學作品，其中僧祐《釋迦譜》彙編佛傳經典而成譜系之作影響最為深遠。曲折的佛傳故事亦成帝王、文士創作之題材，與文士往來密切的僧人支遁、以及梁簡文帝、沈約、王融等皆加以運用。最早的佛傳文學——支遁〈釋迦文佛像讚并序〉之一詩序，內容與「佛像」相關也可能配有佛傳圖，故以「佛傳」作為讚佛之「詩序」，從此文中可見支遁以玄學術語詮解佛傳之敘事手法，可知佛傳已漸中國化且為文士所接受。另外唐前尚有配合佛教儀式之讚佛詩歌運用佛傳情節，例如：佛誕節之於王融〈法樂辭〉、行城與齋戒儀式之於〈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等，主要汲取佛傳元素進行

抒情詩之創作，如：取佛陀遊四城門之情節而以詩歌抒發四門所見「苦」之情緒與時光流逝之感，多以抒情見長而少有敘事作品。在世俗中雖未見佛傳文學作品，但從現存具佛傳情節之造像碑如：北魏太安三年(457)〈宋德興造像記〉、東魏武定元年(543)河南河內北孔村的〈道俗九十人等造像銘〉等，亦可推知釋迦信仰與佛傳故事亦流行於世俗。總之，由唐前零星之文學作品可見，佛傳故事在唐前主要流行於僧人與知識份子間，世俗百姓多以造像、立碑方式進行祈願，尚未見文學創作。

然而此一文學主題至唐代則別開生面，有多元體裁之作品，並展現多樣化悉達多太子成道之故事，除了中國化更「世俗化」。不僅仍有高僧、文士參與創作，至為豐富的敦煌佛傳文學作品，更呈現俗文學作者改造佛傳故事豐沛的生命力。本論文分析唐代高僧、文士、庶民三種不同身分階層作者群所汲取既定佛傳經典題材而進行之創作，得出以下結論：

唐代佛傳文學就文獻數量與文學形式而言，皆明顯多於唐前，可謂創作一高峰。高僧道宣承同樣身為律師之僧祐所作《釋迦譜》，將之改寫成《釋迦氏譜》，並基於律師護法、宏教之使命，於《廣弘明集》中保存許多唐前佛傳文學之作及唐代釋玄則〈禪林妙記前集序〉，較完整地保留前朝與初唐時「佛傳」在教內及文士階層間流傳之文獻，為其重要之貢獻。唐代文士則同唐前多以佛傳元素化用入詩，顧況〈八月五日歌〉：「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白居易〈贈僧五首：宗實上人〉：「今古雖殊同一法，瞿曇拋卻轉輪王。」、元稹〈盧頭陀詩〉：「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等皆可見化用佛傳元素入詩。然不同於唐前文士者，在於唐代始有文士王勃專為佛陀立傳。王勃分別以〈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二種不同文學體裁呈現佛陀生命行跡，二文皆駢麗行文，鋪張宏麗，誠為典瞻，又取佛陀諸多瑞相時皆採「目帶青蓮」者，且二文至明代時仍受重視，除了洪武丙子年間有山西崇善寺住率眾重刊〈釋迦賦〉、〈帝教事迹〉、〈成道記〉、〈補

陀傳〉、〈清涼傳〉合部印施外，更存大同「大華嚴寺」(上寺)沙門覺同書〈釋迦如來成道記碑〉，此碑不僅刻〈釋迦如來成道記〉，又在成道記後接刻〈釋迦成道賦〉。從諸多可考文獻與碑銘，本論文辨明了〈釋迦佛賦〉應為王勃所作，而非近來學界如：詹杭倫等多以清代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為據而以為晚至金代丁偉仁之作品。另外，從北宋道誠為〈釋迦如來成道記〉所作之注解中可知，王勃還有已佚失之〈釋迦畫像記〉於當時「盛行於世」，可能也是佛傳創作，可見其對佛傳故事之喜愛，多次重新創作，而此立傳之舉或與唐時傳記文學、傳奇小說漸盛之風氣相關。更值得關注的是佛傳文獻數量最多的「敦煌佛傳文獻」，在變文、歌讚、禮懺文書、摘要本等應用文書中皆有以佛傳為題材之創作，就「變文」類作品而言即在31件寫卷中敷衍出14種不同文本，可見佛傳屢屢成為時人文學創作之題材，所創作之文本又屢經傳抄，形成一重要文學主題，展現佛教為吸引庶民信眾，藉教主曲折成道故事化俗以廣邀布施之世俗化面向。

唐代佛傳文學在文藝表現上，不同社會階層之作者則呈現不同敘事手法與敘事結構。道宣承前代之作而改寫，呈現精裁對話，敘事扼要之特色，其中並將文句加以潤飾，儘管譜系之作引經據典，仍有將經典句式重塑而以排偶表現處，可見其對文學手法之重視。王勃之作亦少見人物對話而更為純熟地運用排偶、駢麗句勢以營造文氣，使作品華麗而具美文特徵。〈釋迦如來成道記〉以成道過程與傳法事跡為主而尤重後者，其中連續使用數十個「或」字句排偶之行文方式，藉以表現佛陀四方遊化之敘事手法，較韓愈〈南山詩〉連用「或」字寫終南山之舉，則更早便嘗試此文學技巧；〈釋迦佛賦〉所述內容亦以讚佛、敘事為旨而少以人物對話塑造形象，其中尤重視涅槃意義，由於採用賦體表現，重視音韻，文學技巧上更重語言之精煉與辭藻之雕琢，避用俗語而以借代法藻飾，全賦呈現華麗之感，亦得以想見作者之才學。相較有充分教養與自覺的高僧、文士，佛傳在庶民間的傳播顯然著重以人物

行為與對話，藉以塑造較為飽滿之人物形象，甚至渲染強烈的情緒，例如：〈太子成道變文（一）〉在悉達太子面臨「出家」與「孝親」之生命抉擇時，淨飯王：「發聲大哭」、「哽咽填胸」、「腸斷淚流」；又如：〈太子入山修道五更轉〉中表現太子對父母憶憐之不捨，以及耶輸陀羅「憶我向門前，眼應穿」，敘述妻子日夜等待之思念與擔憂；此外，〈悉達太子押座文〉中「父王憶念號咷哭，慈母捶胸發大聲」、「朱駱白馬淚雙垂，車匿聞言聲哽咽，渾拋自撲告夫人。」等皆渲染出濃厚的離別情緒，顯示庶民間流行之佛傳文學對人物形象之重視，特寫人物情緒而欲呈現血肉飽滿並符合人情、人倫之佛陀形象，藉以引起閱聽者之共鳴。

唐代佛傳文學在佛傳情節之表現上，由道宣開「八迹」書寫並以清楚標目呈現「八相」，又敦煌文學中有〈八相變〉、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欲以「八門」講述經典之舉，皆可見以「八相」敘述太子成道故事，在唐代文學中已成一重要敘事模式。然而在「八相」中，不同敘事者對於情節之取捨各殊，以較宏觀「法義／血脈」之視角檢視，可見：高僧、文士對「法義」較重視，故道宣於《釋迦氏譜》中增補中印度地理時，反覆強調佛陀所擇降生之地「處中」，「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之義，或欲提高佛教地位以回應時代關注之三教之爭，又於敘事中表現對法滅思想之看法等，皆可見其身為一代律師所持「護教」、「宣教」之精神。道宣在《廣弘明集》「法義」篇中所收唐代玄奘〈禪林妙記前集序〉，亦見其對「法義」之重視，以「佛傳」作為統攝全書之「序」，以之說明全書欲闡「真、俗」、「染、淨」之理，展現佛陀「修證之塗」並「汲引之範」。而文士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在情節比例上特重成道後「轉法輪」、「涅槃」之事，〈釋迦佛賦〉亦側重「涅槃」並於其中表現佛理，皆可見其佛學術養與對法義之看重，欲於情節架構中彰顯佛法之意義。相形之下，敦煌佛傳文學在則簡化佛理、少述涅槃，轉而可見其對「血脈」的重視。以寫卷數較多而故事較完整之

〈太子成道經〉與〈八相變〉觀察，〈太子成道經〉系列變文重視太后乞子、耶輸產子、佛陀認子之情節，並衍伸出佛陀救耶輸母、子使火坑化作清涼池之敘事高潮，顯示庶民所關注的是耶輸之子是否為悉達多太子之骨肉的「血脈」問題；又〈八相變〉系列變文則演繹出有人質疑降生之悉達多太子為鬼魅、再經泥神占驗其來歷等情節，又以不同形式轉化，表現庶民對王子是否為皇室血統之關注，中國人自古對「血統」、「血脈」之重視於此宗教文本中嶄露無遺，說明重視聽眾反應的講唱故事文本迎合世俗關注話題之情節選擇。

然而，宗教文學無論訴求對象之階層，其目的仍以宣教為宗旨，律師道宣之作可謂柔性之「護法文學」，並非辯駁、攻擊而以宣傳、釋義為要，欲藉教主一生事蹟起信，作為信徒生命之典範，並藉以闡述己身對佛傳的理解，從中傳達佛法之意義。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在宋代以後即有注本，且歷代多有寺院為其文立碑，當欲將之以碑刻永傳後世，可見在教內廣受重視，其既重法義又能以文學手法引人入勝，故能達極佳宣教效果，得流傳而不朽。至於敦煌文學於庶民間講唱、流行，並延伸出豐富多樣之文本，在唐代以後仍可見明、清寶卷中有〈悉達太子寶卷〉、〈雪山寶卷〉於民間講述太子成道故事，可見俗文學生命力豐沛而不衰，能使悉達太子成道之故事，持續不斷於世間講唱流傳。

